

《奎章总目》发覆

袁 成

内容摘要:朝鲜书目之中,《奎章总目》备受学界关注,然其成书、版本等问题却有待进一步厘清。正祖时期,以徐命膺为首的徐氏家族奉命编撰《奎章总目》。起初《奎章总目》包括两部分:皆有窝所藏华本(《皆有窝书目》)以及西库所藏东本(《西库书目》),但由于体例的原因,最终《西库书目》未能纳入,故今所见《奎章总目》完全等同于《皆有窝书目》。纯祖时期,经前朝参编者徐滢修的提请,《奎章总目》得到校正与增订。现今通行的奎章阁本乃纯祖朝增订本,而无人问津的伯克利本乃正祖朝修撰本。《奎章总目》作为官修书目,虽有增修校订的过程,但仍存在不少失察之处,宜作补正。

关键词:《奎章总目》 朝鲜书目 奎章阁本 伯克利本

朝鲜正祖李祮在王世孙时期就有“贞麟堂”储其藏书,徐命膺《贞麟堂记》云:“今我邸下以英睿之姿,求精一之道,胄筵讲说,动惊人听,乃曰:学不博,无以致其约也。凡经史子集,百家之书,兼收并蓄,芸缃缥帙,悬以牙签,即燕居之傍而堂焉,取夫子系《易》者,颜曰‘贞麟’。”^①李祮即位以后,奎章阁相关制度逐渐完备,以皆有窝(阅古观)庋藏华本,以西库(西序)庋藏东本,南公辙诗云:“东西分两厢,甲乙罗四库。牙签标书穴,绨裘见墨庄。”^②

作为朝鲜时期的官修书目,《奎章总目》不仅是为数不多的解题式书目,

^①徐命膺:《保晚斋集》卷八,《韩国文集丛刊》第233辑,民族文化推进会,1999年,第212页。

^②南公辙:《金陵集》卷二《与徐庆世承召曝晒阅古观书籍,上自内苑亲临,仍蒙赐书数百卷,恭志感激》,《韩国文集丛刊》第272辑,民族文化推进会,2001年,第34页。

而且编纂原则上还是按照四部分类,因此长期以来颇受学界重视^①。但是,关于《奎章总目》本身仍有不少文献学层面的基本问题尚待厘清。比如《奎章总目》具体的成书经过是怎样的,实际责任者又是谁?《奎章总目》既曰“总目”,应当包括皆有窝所藏华本与西库所藏东本,为何通行的奎章阁本完全等同于《皆有窝书目》?带着这些问题,笔者拟从文献版本的角度对《奎章总目》进行详考。

一、《奎章总目》的成书过程

张伯伟认为《奎章总目》经历过两次修撰:徐命膺为第一次修撰(正祖三年之前),徐浩修为第二次修撰(正祖五年六月前),而今本为徐浩修本,《正祖实录》相关记载有误^②。《正祖实录》的记载确实存在问题,但张伯伟的说法亦值得商榷。

《正祖实录》有两条关于《奎章总目》修撰的记录,正祖五年(1781)二月十三日载:“华本藏皆有窝,东本藏西库,命原任提学徐命膺撰《奎章总目》。”^③同年六月二十九日又载:“《奎章总目》成……至是,命阁臣徐浩修撰著书目,凡经之类九,史之类八,子之类十五,集之类二,《阅古观书目》六卷,

①就笔者所见,关于《奎章总目》的主要论著有末松保和:《奎章閣と奎章總目》,《小田先生颂寿纪念朝鲜论集》,日本大阪屋号书店,1934年,第399—418页。慎镛夏:《奎章總目解題》,《奎章閣》第4辑,1981年,第93—98页。宋日基:《奎章總目考》,中央大学书志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,1982年。宋日基:《〈奎章總目〉と〈閱古觀書目〉》,《清浪郑馳漠博士花甲纪念论文集》,中央大学文献情报学科同门会,1990年,第409—460页。郑万祚:《朝鮮 正祖代〈奎章總目〉之編纂與其特徵》,《慕山学报》第8辑,1996年,第675—702页。朱光立:《〈奎章总目〉初探》,《山东图书馆季刊》2007年第4期,第89—94页。郑豪薰:《〈奎章總目〉과 18세기 후반 조선의 外來知識集成》,《韩国文化》第57辑,2012年,第91—125页。李尚镛:《〈奎章總目〉의 목록기술방식에 대한 연구》,《韩国文献情报学会志》第47辑,2013年,第377—388页。李尚镛:《〈奎章總目〉저록해제를 통한 도서의 질적 수준에 관한 연구》,《书志学研究》第58辑,2014年,第247—285页。金镐:《18世纪后期朝鲜朝廷的中国图书收集及其学术风尚——以〈奎章总目〉为讨论的范围》,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2016年第1期,第118—127页。金镐:《〈奎章總目〉의 “臣謹按”研究》,《中国文学研究》第70辑,2018年,第73—97页。周治甫:《朝鲜朝〈奎章总目〉研究》,延边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学位论文,2022年。

②张伯伟:《二十六种朝鲜时代汉籍书目解题(上)》,《文献》2004年第4期,第66页。

③实录厅编:《正祖实录》正祖五年二月十三日,太白山史库本。

《西序书目》二卷，总名之曰《奎章总目》。”^①需要留意一下，受到正祖委任的是徐命膺（1716—1787），而撰成《奎章总目》的却是其长子徐浩修（1736—1799），而彼时徐命膺尚未殒没。

不妨再来看一下《内阁日历》的相关记载，正祖三年（1779）十一月二十三日载徐命膺以《皆有窝书目》厘正事入来。至于正祖五年（1781）五月，却是徐浩修前后四次以《皆有窝书目》修正事入来。盖张伯伟据此将徐命膺第一次修撰系于正祖三年之前，而将徐浩修第二次修撰系于正祖五年六月之前。

那么，正祖朝果真分别命徐命膺、徐浩修父子两次修撰《奎章总目》吗？今本《奎章总目》凡例未见于徐命膺《保晚斋集》，而是收于其次子徐灌修（1749—1824）《明皋全集》。此外，纯祖朝增订《奎章总目》亦是由徐灌修提请，他明确表示自己于先朝承命编修《奎章总目》。由此可见，《奎章总目》由徐氏家族通力经年累月纂成，参编的不仅有徐命膺、徐浩修，还有徐灌修，甚至可能有家族其他成员，具体由谁向正祖反馈工作进度其实并不重要，将正祖朝修撰《奎章总目》视作一次，或更为妥当。

可惜的是，纯祖朝增订《奎章总目》并没有徐氏家族参与。尽管增订之事由徐灌修提请，但纯祖委任的却是朴宗薰（1773—1841）。

灌修曰：“书目事有言端，故敢仰达矣。臣于先朝承命编《奎章总目》，凡内府书籍，并载撰人名氏、纂辑本末，或附以前辈议论，成一部书……《奎章总目》编入后，亦必多新购书籍，使待教详加订定，陆续编入，似好矣。”……上下《奎章总目》，因教宗薰曰：“此书中未及收载者，考定增修以入，可也。”^②

徐灌修此番提请也从侧面说明一个问题：《奎章总目》在正祖朝成书后就被搁置一旁，直到纯祖朝时徐灌修才再次提及，期间不存在增修之举。《群书标记》说《奎章总目》“继此而购得者，将随得随录也”^③，但其实并未真正践行。

朴宗薰对于《奎章总目》的熟悉程度自然比不上徐灌修，当纯祖询问某书是否被书目著录时，朴宗薰摸不着头脑，徐灌修却一言即中。

上曰：“《清一统志》与《名山胜概》等书何如？”……上曰：“阅古观有之乎？”宗薰曰：“未能详知矣。”……上命宗薰考见书目，宗薰考

①实录厅编：《正祖实录》正祖五年六月二十九日，太白山史库本。

②承政院编：《承政院日记》纯祖五年四月二十八日，奎章阁藏写本。

③李詮：《弘齋全書》卷一八三《群书标记》五，《韩国文集丛刊》第267辑，民族文化推进会，2001年，第558页。

见讫，奏曰：“无之矣。”灌修曰：“《总目》中似有之矣。”宗薰曰：“果然矣。”^①

除朴宗薰之外，纯祖还曾数次向洪奭周（1774—1842）询问工作进度。洪奭周在主持增订工作的时候，向纯祖提过两种方案：第一种是将新增的书目直接续添在原书，第二种是将新增的书目别作一册。纯祖综合两种方案，先要求呈进新增书目，之后再将“原本”与“续本”重新汇整为一部。

上曰：“《奎章总目》何间可讫工耶？”奭周曰：“秘府可考书籍已尽请出，编摩亦几讫工，而原书以时世先后为次序，今若以新增之目添入于旧本之下，则三代汉唐之书反居于清人文集之下，凡例未免淆乱，不可不一从次第，从头厘正。不然，则以新增之目另为一册亦可。当一番稟裁而为之矣。”上曰：“从头厘正与另为一册，何者为胜耶？”奭周曰：“从头厘正，虽难猝乍讫工，必如是，然后始成册子体段矣。”上曰：“若另为一册，则几日可毕？”奭周曰：“缮写之役，不过数日当完，而原书亦有不可不厘正者矣。”上曰：“然则从当合为一册，而今番则姑先另写一卷以入。阁臣出去，即速缮成也。”^②

洪奭周认为原本（即正祖朝修撰本）有不少讹误，也需对原本进行厘正校订。而新增书目之中，《仿宋五经》奉藏于宙合楼，《历代臣鉴》《传家宝》《诗学大成》已经呈进大内，故以上数种只得搁置，未能编入。按照纯祖的意愿，《奎章总目》增订工作结束后，汇整本呈进，原本与续本则留置于奎章阁。

宗薰曰：“《奎章总目》新续者向以草本书入矣。原本中往往有更加厘正者，日前才已校讫，与新本通融编次，另写一件，今方垂毕。而第其中《仿宋五经》则奉藏于宙合楼，故不敢请出。《历代臣鉴》《传家宝》《诗学大成》则内入，故不得编入矣。校役今既告讫，数种见漏者，姑置之似好，当以已编者妆册以入乎？”上可之，仍教曰：“原本与新编俱为眷书乎？”宗薰曰：“然矣。新编诸目从世代增入，则原册当改者过半，故另以新旧合编者眷出一通矣。”上曰：“今日可以入之耶？”宗薰曰：“书役已毕，而方为准役，明日始当入之矣。既以新本内入，则原本姑为留藏本阁乎？”上曰：“顷日所入之草本，亦当还下，与原本并置本阁，可也。”^③

综上，《奎章总目》成书于正祖五年（1781），由徐命膺、徐浩修、徐灌修等人负责，增订于纯祖五年（1805），由朴宗薰、洪奭周等人负责。

①承政院编：《承政院日记》纯祖五年四月二十八日，奎章阁藏写本。

②承政院编：《承政院日记》纯祖五年五月十七日，奎章阁藏写本。

③承政院编：《承政院日记》纯祖五年六月八日，奎章阁藏写本。

二、《奎章总目》的“名”与“实”

今本《奎章总目》名不副实，徒有“总目”之名，却无“总目”之实。从逻辑上讲，作为奎章阁的“总目”，理应包括皆有窝所藏华本以及西库所藏东本，但今本仅仅涵盖华本部分，实在令人费解。

特别需要强调的是，所谓“华本”和“东本”的概念，惟一的划分标准是刊写地（出版地），跟原著的作者、内容都无关。具体来说，华本即中国本，亦称唐本，从中国进口而来；东本即朝鲜本，亦称乡本、常本，在朝鲜本土刊写而成。朝鲜纯祖对于东本和华本的概念也产生过误解，他一度以为《宋史筌》藏于阅古观，命人搜寻却未果，最后还是朴宗薰提醒说，阅古观专门藏中土版本，而《宋史筌》藏于西库。

上曰：“阅古观铁笼窗下似曾有《宋史筌》，向日使之内入，则搜之不得云。阁臣其知之乎？”宗薰曰：“其时臣不在直，未得详知。而阅古观只是唐板册而已，《宋史筌》一件在于西库矣。”^①

虽然《宋史》记载的是中国的历史，但正祖君臣在《宋史》基础上编写的《宋史筌》应属于东本（朝鲜本）的范畴。

笔者推测：按照正祖最初的构想，《奎章总目》的确包括华本与东本两个部分，但随着编纂的推进，此种构想不得不被舍弃，最后只保留华本部分，即《皆有窝书目》。

表1 不同材料中《奎章总目》所指

出处	记载	指称
《正祖实录》正祖五年二月十三日	华本藏皆有窝，东本藏西库，命原任提学徐命膺撰《奎章总目》。	《皆有窝书目》 《西库书目》
《正祖实录》正祖五年六月二十九日	《阅古观书目》六卷，《西序书目》二卷，总名之曰《奎章总目》。	《阅古观书目》 《西序书目》
《奎章总目》凡例	此书所录，既皆本阁藏弆之书，则名之以《奎章总目》，盖推集贤、崇文之旧例，而华本之峙皆有，东本之峙西序，亦各因其实而著其目也。	《皆有窝书目》 《西序书目》
《群书标记》命撰一	秘府藏书之所，华本在阅古观，东本在西库。是书所录者，阅古观之华本也。	《阅古观书目》

据表1，除《群书标记》之外，大多数材料都记载《奎章总目》囊括华本与东本两个部分。《群书标记》由徐灌修初草，徐浩修续编，徐荣辅、沈象奎补完。

①承政院编：《承政院日记》纯祖五年四月二十七日，奎章阁藏写本。

日本东京都立图书馆所藏写本《群书标记》可以确定是徐浩修续编本，其著录“《奎章总目》六卷”曰：“奎章阁藏书，一曰阅古观，四部皆华本也，一曰西库，四部皆东本也。命阁臣标其卷帙多少、义例得失，裒成目录，命名曰《奎章总目》。阅古观四部为四卷，西库四部为□卷。”下划线部分文字被涂抹，西库部分的卷数不可辨识，但据“六卷”之总数，可推为“二卷”。从续编本的“阅古观四部为四卷，西库四部为二卷”到补完本的“是书所录者，阅古观之华本也”，《群书标记》清楚地呈现出《奎章总目》的内容变化^①。

今存正祖朝所修《西库（西序）书目》凡三种：《西库藏书录》《西序书目签录》《西序书目草本》，皆为登记式书目。其中《签录》按照四部分类，而卷末尚有《西库别录》，整体视作二卷亦未为不可，《奎章总目》原本拟定收录的二卷本《西库书目》或即此种。

那么，《奎章总目》为何在编纂过程中要将东本部分剔除，只留下华本部分呢？最大的原因应该是体例上不统一。《奎章总目》预设的体例为解题式书目，《皆有窝书目》符合预设故予以保留，《西库书目》不符合预设故予以剔除。如果将解题式书目与登记式书目合并为一种，无疑会显得不伦不类。

不妨再进一步深究，既然《奎章总目》已有解题式的预设，为何东本部分仍撰成登记式书目？一方面，西库所藏东本的流通量远大于皆有窝所藏华本。东本的刊写与入藏在朝鲜半岛不过是寻常之事，但华本只能依赖于从中国进口，其途径也无非是中国赐书和燕行购书。再者，如果要调阅皆有窝中的书籍，需有“牙牌”才能请出，至于西库中的书籍，则没有类似的规定。因此，皆有窝中华本的数量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，适合采用解题式书目；西库中东本的数量变化较大，还是登记式书目起到的清点作用更为实用有效。另一方面，《镂板考》与《群书标记》皆成于正祖朝。《镂板考》以朝鲜册板为收录范围，《群书标记》以正祖御纂为收录范围，两种都属于东本的解题式书目，与西库所藏东本有较大程度的重合，如再作解题式的《西库书目》则有繁冗之嫌。

三、“奎章阁本”与“伯克利本”

现今通行的《奎章总目》为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所藏写本（索书号：奎 4461，以下简称“奎章阁本”），四卷三册，四卷分别对应四部：“皆有窝甲库·经”、“皆有窝乙库·史”、“皆有窝丙库·经”、“皆有窝丁库·集”。韩国方面早在 1931 年已将此种影印（收入《奎章阁》第 4 辑），而中国方面中

^①关于《群书标记》的成书与版本研究，详参袁成：《〈群書標記〉의 成立과 版本에 대한 再考》，《湖上古典研究》第 80 辑，2023 年，第 413—438 页。

华书局在2004年出版《朝鲜时代书目丛刊》时将此种收录。

将奎章阁本用作研究资料之前，厘清其性质是第一要务。张伯伟认为此种是正祖朝的“徐浩修本”^①，其实不然。《群书标记》详载所谓“徐浩修本”《奎章总目》收书的数量：“遂命阁臣徐浩修著之为目……凡经之类六十，史之类一百二十，子之类一百四十八，集之类二百七十九。”据此，徐浩修本收书607种。但是，现今的奎章阁本收书697种，远大于前者的数量。奎章阁本著录清朝嘉庆皇帝御制《味馀书室全集》，其刊刻时间为嘉庆五年（1800），其时徐浩修已经离世，显然奎章阁本与徐浩修本完全不是一回事。

除奎章阁本外，尚有别本《奎章总目》存世。今之学者皆瞩目于奎章阁本，未曾讨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藏本（索书号：ASAMI 25.1，以下简称“伯克利本”）。此种隶属于浅见文库，即浅见伦太郎（1869—1943）旧藏。浅见氏在日据时代曾担任朝鲜总督府判事，期间致力于搜集朝鲜典籍。浅见氏殁后，家人将这批文献卖给三井家族，再后来随三井文库一同为伯克利所收购。

伯克利本《奎章总目》同样是写本，四卷三册，凡例页钤有“吉礼第四”阳文椭圆印，卷一页钤有“东莱”阴文方印、“郑基一印”阴文方印、“大始”阳文方印。郑基一（1787—1842）字大始，出于东莱（今釜山广域市）郑氏，纯祖十三年（1813）癸酉增广试方中生员，因此郑基一不太可能参与《奎章总目》的修撰或增订，大概率只是递藏者之一。

诸多证据显示，奎章阁本和伯克利本不是“正本·副本”的关系，而是两种不同的版本。伯克利本贴有少量签条，而签条上的评论意见，几乎都在奎章阁本得到修正，可见伯克利本当早于奎章阁本。比如伯克利本《奎章总目》卷四集部总集类收录《唐诗所》，但题下实为《诗所》解题，签条曰：“此段误以《古诗所》为《唐诗所》，当改正。”至于奎章阁本则将《诗所》与《唐诗所》两书分别著录。

表2 各版本《奎章总目》收书数量

	《群书标记》所载	伯克利本	奎章阁本
经	60	64	78
史	120	119	134
子	148	150	182
集	279	277	303
合计	607	610	697

^①张伯伟：《二十六种朝鲜时代汉籍书目解题（上）》，《文献》2004年第4期，第66页。

从伯克利本到奎章阁本，两者收书的具体差异如下：

(一)新增 89 种

总经类新增《周易、书传》^①；易类新增《易象意言》；书类新增《书传大全》《融堂书解》；诗类新增《诗经大全》；春秋类新增《左传释义评苑》《春秋公羊传》；礼类新增《礼记大全》《礼记》；四书类新增《四书大全》《四书》《四书人物备考》《四书异同条辨》；小学类新增《说文解字》。以上经部新增凡 14 种。

正史类新增《汉书》《明史稿》《通鉴纲目前编》《和汉历代备考》；别史类新增《战国策谭概》《三朝要典》《颂天胪笔》《东江问答》《战国策去毒》《剿捕临清逆匪纪略》；掌故类新增《武英殿聚珍版程序》《刑部重囚招册》；地理类新增《重修姑苏志》《舆地图》；总目类新增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。以上史部新增凡 15 种。

儒家类新增《明本释》《性理大全会通》《日知荟说》《太学典礼汇考》《续近思录》《广近思录》《家规类编》；历象类新增《五经筹术》^②；医家类新增《金匱要略广注》《小儿药证》；道家类新增《周易参同契解》；杂家类新增《玉匣记》《广玉匣记》；说家类新增《太平广记》《岁寒堂诗话》《浩然斋雅谈》《云谷杂记》《猗觉寮杂记》《学林》《考古质疑》《朝野类要》《敬斋古今隽》《研北杂志》《丹铅余录》《小窗自纪》《古今诗话》；艺玩类新增《考古图》《绎帖平》《宝真斋法书赞》《墨法集要》《淳化阁帖释文》；类书类新增《白孔六帖》《翰苑新书前集》《广博物志》。以上子部新增凡 34 种。

总集类新增《历代名臣奏议》《古文鸿藻》《五先生文隽》《文娱》《古诗纪》《诗所》《唐十家集》《广雅》《古乐苑》《石仓历代诗选》《古文渊鉴》；别集类新增《元宪集》《景文集》《彭城集》《忠肃集》《止堂集》《渊颖吴先生集》《王文恪公集》《王氏家藏集》《北海集》《凤岩山房文草》《苍耳斋近稿》《冯少墟集》《康熙御制集》《乾隆御制集》《味馀书室全集定本》。以上集部新增凡 26 种。

(二)删削 3 种

史部别史类删削《战国策》。子部杂家类删削《天学解惑》。集部别集类删削《潜安遗稿》。

①《奎章总目》著录作一个条目“《周易》一本、《书传》一本”。若两书独立，则不应在总经之列。

②为避正祖李祿名讳，《奎章总目》中所载《五经算术》改作《五经筹术》（详参袁成：《〈字类注释〉新探》，《汉字研究》2022 年第 1 期，第 135—154 页）。

(三)著录分合修订 1 处

史部正史类中的《南史》与《北史》在伯克利本合为一题，而奎章阁本将两书分别著录。

(四)部类归属修订 4 处

《通鉴纪事本末》从编年类移至别史类。《贞观政要》从掌故类移至别史类。《彤管遗编》从子部说家类移至集部总集类。《草堂诗餘》从别集类移至总集类。

正如前文所言，《奎章总目》大体可以分为正祖朝修撰本与纯祖朝增订本。笔者认为：伯克利本很有可能是正祖朝修撰本，即纯祖时洪奭周曾予校订的“原本”；奎章阁本应该是纯祖朝增订本，即纯祖时重新誊写一通的“汇整本”。

四、《奎章总目》补正

从伯克利本到奎章阁本，《奎章总目》部分失误得以修正。比如几处部类归属的问题：纪事本末体是别史的一类体裁，《通鉴纪事本末》确实应该归入别史类；《草堂诗餘》原被误认作杜甫诗集，但其实是南宋何士信编辑的词选，确实应该归入总集类；《彤管遗编》是明代郦琥编辑的女性诗文选集，确实应该归入总集类。但是，《奎章总目》仍存在不少值得讨论的问题，兹以经过增订的奎章阁本作为底本，略作补正。

1.《四书辑释章图大成》二十三本(卷一经部四书类)

此种并非华本，题下有“日本板”小字注，解题亦云：“《浙江遗书总录》载此书，而缺《泰伯》《子罕》《乡党》三篇……浙江乃古书遗家之所萃，而只此元刊一本，已失《鲁论》三篇，则流传海外之殊域，得见倪氏之完书，岂非幸欤？”此种当为和刻本无疑。正祖建阅古观以藏华本，建西库以藏东本，却没有考虑到少量的和刻本。

2.《会海字汇》十四本(卷一经部小学类)

解题云：“明梅鼎祚因梅膺祚之《字汇》而著音释。”梅鼎祚为从弟梅膺祚撰《字汇序》后并无校订增修之举，其于序中亦言明自己对于“字学”涉猎甚少：“鼎祚不类，眇所涉，无以赞。”^①绝大多数版本的《字汇》每集皆题“宣城梅膺祚诞生音释”，《奎章总目》言梅鼎祚“著音释”则谬矣。《字汇》自问世便颇有市场，版本繁多，“会海”二字只不过是众多名目中的一种，贵文堂、敦化堂等刊本皆以《会海字汇》为名。此外，义盛堂、裕德堂等名以《文成字汇》，怀德堂等名以《汝南字汇》，文盛堂等名以《霞光字汇》，大雅堂等名以

^①梅膺祚：《字汇》，明万历四十三年刻本。

《玉鼎字汇》，文英堂等名以《玉堂字汇》，诸如此类。

3.《和汉历代备考》四本(卷二史部别史类)

此种同样是日人所编，但无“日本板”之注记。今藏书阁存《和汉历代备考》写本四册(索书号：K2-125)，卷题“新编和汉历代帝王备考”，乃据日本贞享四年(1687)华阳书肆刊本抄录而成，此种有可能是《奎章总目》著录本。但不论《奎章总目》著录的是日本刊本还是朝鲜抄本，都与“皆有窝藏华本”的原则相违背。

4.《史荟》五本(卷二史部别史类)

解题云：“明王世植编。”“王世植”当作“王家植”。王家植字仲木，万历三十二年(1604)进士。今奎章阁存《史荟》五册(索书号：奎中4007)，书中钤有正祖藏书印“朝鲜国”“弘斋”“万机之暇”等，当为《奎章总目》著录本。

5.《天运绍统》二本(卷二史部别史类)

解题云：“明周王櫨编，櫨号臞仙。”《奎章总目》误将朱权与朱櫨混为一谈。朱櫨为朱元璋第五子，封周王，著有《救荒本草》。朱权为朱元璋第十七子，封宁王，别号臞仙、涵虚子，《天运绍统》即朱权所著。

6.《孤树哀谈》五本(卷二史部别史类)

解题云：“明杨循吉辑录三十一家野史之言，以时代次之，始太祖，迄武宗。”《孤树哀谈》引用书目凡30种，并非“三十一家”。《孤树哀谈》旧题李默撰，黄虞稷《千顷堂书目》主张赵可与撰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则两存之。据今人郭小霞考证，《孤树哀谈》的作者当是李默无疑^①。李默字时言，一字古冲，官至吏部尚书，故称“李太宰”，著有《群玉楼集》《建宁人物传》等。《奎章总目》之所以错言编辑者与引用书目乃是版本局限：今奎章阁存十卷本《孤树哀谈》五册(索书号：奎中3218)，无序跋，书首《孤树哀谈引用书目》列尽后未加统计，而《三朝圣谕录》在“三朝”后抬行书写“圣谕录”，占两行，难怪乎《奎章总目》错认作31家。《孤树哀谈》别有五卷本，卷首有《重刻孤树哀谈叙》，点明编辑者为“李古冲太宰”，《孤树哀谈引用书目》里面的《三朝圣谕录》仅在“三朝”与“圣谕录”之间空一字，末尾也统计作“以上共三十种”^②。

7.《舆地图》十三本(卷二史部地理类)

解题云：“清乾隆庚辰制。康熙时遣人诣各部……复遣明安国等厘定，分为十三幅，合为全本。”误，“明安国”当作“明安图”。明安图字静庵，清代蒙古族科学家，在天文历法、地图测绘等方面贡献甚大。

^①郭小霞：《〈孤树哀谈〉小考》，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2004年第6期，第21-24页。

^②李默辑：《孤树哀谈》，明万历二十年游朴刻本。

8.《性理大全》二十二本(卷三子部儒家类)

解题云：“明永乐时翰林学士胡广等奉敕编。首编周子《通书》、张子《正蒙》、邵子《皇极经世书》、朱子《易学启蒙》《家礼》、蔡元定《律吕新书》、蔡沈《洪范内篇》，复采先儒格言至论，各以类分，曰理气，曰鬼神，曰性理，曰道统，曰诸儒，曰学，曰诸子，曰历代，曰道，曰治道，曰诗文，凡十一门。”《性理大全》前半部分收录宋儒著作9种，《奎章总目》尚少言周敦颐《太极图说》和张载《西铭》。《性理大全》后半部分共有13门，《奎章总目》尚少言“道统”门和“君道”门。

9.《张中丞证集》一百七十二本(卷三子部儒家类)

解题云：“清仪封张伯行辑。分四部，一曰立德，二曰立功，三曰立言，四曰气节。”《奎章总目》所谓的《张中丞证集》当指张伯行所辑《正谊堂丛书》，今奎章阁所存为同治年间重刊本(索书号：奎中4462)，并非《奎章总目》所著录者，故一时难以详考。然此种属于丛书汇编，宜归入卷三子部丛书类。

10.《说铃》十六本(卷三子部说家类)

解题云：“清吴震芳撰。”“吴震芳”当作“吴震方”。吴震方字青坛，康熙十八年(1679)进士，著有《晚树楼诗稿》《读书正音》《岭南杂记》等。

11.《汇苑详注》十七本(卷三子部类事类)

解题云：“明国学生晋江邹道光辑录典故而分门汇之。”“邹道光”当作“邹道元”。按黄凤翔序文，重订者邹氏，“道元”为其名，“善长”为其字^①。

12.《天中记》三十本(卷三子部类事类)

解题云：“明沔阳陈文烛辑。”误，陈文烛仅是作序者，而陈耀文才是编辑者。陈文烛字玉叔，嘉靖四十四年(1565)进士。陈耀文字晦伯，嘉靖二十九年(1550)进士。

13.《翰墨大全》十六本(卷四集部总集类)

解题云：“明刘应季编。”“刘应季”当作“刘应李”。刘应李生活于宋元之交，咸淳十年(1274)进士，入元不仕，《奎章总目》谓“明”亦谬甚。此外，《翰墨大全》属于日用类书的范畴，宜归于卷三子部类事类。

14.《十六家小品》八本(卷四集部总集类)

解题云：“明西湖何伟然选。”误，何伟然仅是作序者，《皇明十六家小品》由陆云龙选评。陆云龙字雨侯，号蜕庵、翠娛阁主人。

15.《皇明两朝疏抄》十二本(卷四集部总集类)

解题云：“未详选人。”《奎章总目》之所以题“未详选人”，是因为误读李幼滋序文。李氏《皇明嘉隆疏抄序》曰：“大名郡守桂君以其台中时得都谏石

^①王世贞辑，邹道元增订：《汇苑详注》，明万历二十三年刻本。

葵贾公所辑稿若干卷,谋梓之,会弗果,而司理顾君成其志,以续疏辑之传,乃走使请弁言于余。”^①据此,“贾公”为编辑者,“顾君”为赞助付梓之人。但是,《奎章总目》却转述成:“大名郡守桂君得贾石葵所辑稿若干卷,谋梓之,不果,而司理顾君成其志,以续辑之。”这样理解的话,编辑者的归属自然会在“贾公”和“顾君”之间摇摆。贾三近字德修,号石葵,隆庆二年(1568)进士。除卷首贾三近自序外,王毓阳《重刻嘉隆疏抄序》曰:“今天雄重刻《嘉隆疏抄》,盖大中丞贾公昔所辑,而今再较者也。”^②《重校嘉隆疏抄目录》次行亦题“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前户科都给事中峰阳贾三近汇集”,皆可证《皇明嘉隆疏抄》编辑者为贾三近。

16.《皇明奏疏》五十本(卷四集部总集类)

解题云:“明代御史少泉汪□编,孙维城、方万山等增删。”《奎章总目》著录的《皇明奏疏类钞》是万历十六年(1588)重刻本,但编者汪少泉名字未详。吕藿《皇明奏疏类钞序》但称“陪都御史大夫汪公”^③,姜宝《重刻皇明奏疏类钞序》曰:“前御史大夫少泉汪公所编辑,授梓留台前,中丞日洲吕公所尝序而传者。顷,侍御卫宇孙公、钟岳方公以所收为未备,乃与诸侍御搜往牍、稽故实,多有增入,间亦有删去之者,命工重校刻。”^④即便到今天,学者也往往直接署以“汪少泉编”。经笔者考证,汪宗伊(1510—1586)字子衡,号少泉,嘉靖十七年(1538)进士,因忤严嵩而自请罢归,隆庆年间在南京重起为官。今奎章阁存《皇明奏疏类钞》二十六册(索书号:奎中3697),即《奎章总目》著录本。

17.《唐十家集》九本(卷四集部总集类)

解题云:“明永嘉张逊业辑唐王勃、杨炯、卢照邻、骆宾王、宋之问、沈佺期、王维、孟浩然、陈子昂、高适十家诗赋,各为一编,唯四杰集首,各有逊业序,馀则否。”此种当为嘉靖三十一年(1552)东壁图书府刊本《唐十二家诗》,每集卷端题有“永嘉张逊业有功校正,江都黄淳子笃梓行”。《奎章总目》尚少言杜审言、岑参二家。今奎章阁存《宋之问集》《杜审言集》合一册(索书号:奎中3884)、《沈佺期集》《陈子昂集》合一册(索书号:奎中3885)、《王勃集》一册(索书号:奎中4060)、《卢照邻集》一册(索书号:奎中4061)、《高常侍集》一册(索书号:奎中4062)、《孟浩然集》一册(索书号:奎中4251)、《杨炯集》一册(索书号:奎中4429)、《王摩诘集》一册(索书号:奎中4875)、

①贾三近辑:《皇明两朝疏抄》,明万历十四年刻本。

②贾三近辑:《皇明两朝疏抄》,明万历十四年刻本。

③汪宗伊辑:《皇明奏疏类钞》,明万历十六年刻本。

④汪宗伊辑:《皇明奏疏类钞》,明万历十六年刻本。

《骆宾王集》一册(索书号:奎中 5403),凡九册,皆为张逊业校正本,书中钤有正祖藏书印“极”“弘斋”等,当为《奎章总目》著录本。由此观之,解题者未能明察《宋之间集》《杜审言集》合于一册的情况,故少言杜审言,奎章阁藏本实际仅缺岑参一家。

18.《中原文献》七本(卷四集部总集类)

解题云:“明编修焦竑撰。经集六卷、史集六卷。”今奎章阁存《新镌焦太史汇选中原文献》七册(索书号:奎中 4416),书中钤有正祖藏书印“万机之暇”“弘斋”等,当为《奎章总目》著录本。解题者未察所藏非全本,尚缺子集七卷、文集四卷、通考一卷。

19.《玉恩堂集》十本(卷四集部别集类)

解题云:“明南京太仆寺卿华亭林景鹏著。”“林景鹏”当作“林景暘”。林景暘字绍熙,隆庆二年(1568)进士。

五、结语

奎章阁之建置完备于正祖朝,华本庋藏于皆有窝,东本庋藏于西库。顾名思义,《奎章总目》乃奎章阁之总目,其著录者理应包括皆有窝所藏华本以及西库所藏东本。但由于解题书目的预设,《西库书目》最终被舍去,今所见《奎章总目》仅为《皆有窝书目》。《正祖实录》将《奎章总目》归于徐命膺名下,《群书标记》将《奎章总目》归于徐浩修名下。但综合《承政院日记》《内阁日历》《明皋全集》等诸多材料来看,《奎章总目》宜视作徐氏家族通力合作的成果。《奎章总目》在正祖五年(1781)编成以后就被搁置,并没有按照原计划对于新购华本“随得随录”,直到纯祖朝才被徐灌修重新提起,转由朴宗薰、洪奭周主持增订工作,最终完稿于纯祖五年(1805)。现今通行的奎章阁本乃纯祖朝增订本,而无人问津的伯克利本乃正祖朝修撰本。

在厘清成书、版本等问题之后,《奎章总目》在目录学上的得与失更易凸显,有利于进一步探讨其文献价值。比如《奎章总目》所著录的佚书、《奎章总目》的四部分类思想等等,都是值得今后深挖的课题。

【作者简介】袁成,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基础课部讲师。研究方向:朝鲜汉学。